

#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能力研究

## ——以省港大罢工的领导结构和经费筹集为例

金安平\*

**摘要:** 距离中共一大召开仅仅 3 年半后的 1925 年 1 月,中共召开了四大,此时全国的党员只有 994 名<sup>①</sup>,还是一个处于幼年时期的政党。但就是这样一个年幼的、人数极少的政党,却显现出了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发动、组织、领导了 25 万人规模的省港大罢工,罢工持续时间长达 16 个月。这不仅是世界工人运动史上坚持时间最长的罢工,也是一个政党动员、组织、领导能力的奇迹。本文认为这一奇迹的实现,固然有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西方帝国主义侵华和殖民剥削压榨的不满与愤怒的基础,也有国共第一次合作和建立统一战线的政治背景。但罢工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政党的功能,把工会作为政党动员最重要的组织和沟通工具,作为政党的组织延伸,形成了政党—工会—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罢工委员会的严密领导结构。特别是解决了筹款募捐这个实现罢工最重要的问题,使得中国共产党完成了革命政党的一次“超能量”的伟大尝试。

**关键词:** 罢工委员会; 罢工工人代表大会; 中华全国总工会; 政党能力

**Abstract:** January 1925, only three and a half years afte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eld its First Congress, the party held the Fourth Congress. With

---

\* 金安平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① 《中国共产党简史》编写组编著《中国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22 页。]

994 party members nationwide , it was still in the infant stage. Such a young and minority party , nevertheless , demonstrated a strong organizational and mobilizational capacity. In this year ,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obilized , organized , and led the Canton-Hong Kong Strike , which had 250 ,000 participants and lasted for 16 months. This is not only the longest strike in the world history of workers' movement , but also a miracle of a political party' s organizational ability , mobilization capacity , and leadership. It is true that the realization of this miracle is rooted in the Chinese people' s grievance and anger about foreign invasion and colonial repression since the modern era , as well as in the political background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But this paper argues the initiator and leader of this strike ,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fully utilized the functions of a political party , using the workers' union as the most important organizational and communication tool for political mobilization and as an extension of the party. A well-organized leadership structure was formed among the party , the union , the congress of striking workers , and the strike committee. In particular , solving the financing problem , the most important problem of striking , mad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ccomplished a great feat that exceeded the power of an early revolutionary party.

**Key words:** Strike committee , Congress of striking workers , All-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 Party capacity ]

虽然对于中国革命的道路到底应该是从农村农民革命开始还是从城市工人革命开始的问题 , 有过争论、选择和重新排序的过程 , 但早期以工人运动为首要任务的中国共产党能以惊人的组织能力发动、领导一场规模巨大的罢工 , 还是显示了一个新生政党的勇气和能力。在罢工中 , 中国共产党主动寻求与国民党的合作也显示了一个年轻政党在政治上的成熟。这场罢工不仅达到了罢工的目的 , 而且收放自如。其原因、模式、方法以及经验和启示 , 都值得深入探讨。

关于省港大罢工的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很多。原始文献资料汇集成书的就有多种 , 比如《中国工人运动文献汇编》(工人出版社 1955 年版)、《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上、中、下)》(档案出版社 1985—1986 年

版)、《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工人出版社 1957 年版)、《省港大罢工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怒涛(省港大罢工回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等等。罢工的重要领导者邓中夏还留下了珍贵的遗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 研究论文则更多。近 20 年来, 对于中国工人运动的研究, 理论性较强和引起讨论最多的专著还是首推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的《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sup>①</sup>。虽然这样一个关于中国早期工人罢工的重大研究是由一位外国学者做出的, 可能会让中国学者有些汗颜或者不甘, 《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多少也受到西方新工人史(new labor history)那种侧重对工人的地域、经历、生活、技能、文化的分析而尽量远离政治、阶级的研究范式的影响, 但该书对工人的差异和内部分裂的研究, 对共产党在多大程度上能发动和依靠工人的分析, 以及“不同的工人从事不同的政治”<sup>②</sup>的结论, 都为深入细致地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工人罢工带来了学术启发。不过, 省港大罢工与上海罢工有所不同。尽管裴宜理在该书中对五卅运动进行研究时也涉及省港大罢工, 但毕竟省港大罢工呈现出与上海罢工不同的地方。无论是对上海罢工的研究还是对省港大罢工的研究, 都不能低估中国共产党影响和整合各类工人的能力。工人的差异越大, 内部越是“分裂”, 就越能证明中国共产党对“五湖四海”的工人阶级的整合能力。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领导一场看起来与自己政党规模完全不相称的罢工? 这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革命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政党能力有关。本文即是从省港大罢工最独特的组织领导结构和最难完成的罢工经费筹集角度分析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动员力与组织力。

## 一、发动工人政治性罢工:

### 中国共产党实现革命领导权的主动行为

五卅惨案的发生是自 1840 年以来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矛盾的一次集中爆

<sup>①</sup> 美国哈佛大学裴宜理的《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中文版(刘平译)曾于 2001 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并于 2012 年再版。2018 年作者修改后由商务印书馆重新出版。]

<sup>②</sup> 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 商务印书馆 2018 年版, 第 239 页。]

发。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本内外纱厂的工人代表顾正红带领工人群众维权时,被日商开枪射中,因伤势过重牺牲。这件事激怒了工人群众,上海各日本纱厂的2万多名工人宣布罢工,并在闸北潭子湾举行公祭顾正红烈士万人大会,呼吁各界人民支持和援助工人斗争。中国共产党从1925年5月28日正式开始直接领导这场斗争。这天深夜,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做出发动上海群众举行反帝示威总行动的决定。总示威于5月30日开始,但英国巡捕开枪镇压示威,当场打死13人,重伤数10人,逮捕150余人。一时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变成了“五卅惨案”!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先是发动上海总同盟罢工,呼吁全国支持,接着决定发动广州、香港工人进行大罢工,以声援上海。

把发动政治性罢工纳入实现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领导权的总战略中,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其使命和任务的总认识。1925年1月的中共四大首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问题,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发展各种工会,以强有力的组织工作来保证领导权的取得与实现。发动和领导工人罢工,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四大之后主动争取革命领导权的重要行动。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1925年),专门做出了《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的决议案》,明确指出将工人经济斗争上升到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工人阶级每个经济的斗争,同时一定要变成政治斗争;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优越地位,是依靠在政治上优越地位之势力保障之上。”<sup>①</sup>

早期工人罢工的目标通常是争取劳动条件的改善和工资待遇的提高。经济性罢工发展到一定阶段和程度后,特别是经过政治动员后,才可能由经济性罢工升级为政治性罢工。我们之所以说省港大罢工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政治大罢工,是因为它不单纯为了改善广州和香港两地工人的经济待遇(虽然省港工人的待遇比内地工人要稍好些,但他们也处在被资本剥削和奴役的劳动环境下),还有着明确的“反帝”的政治总目标,是中国共产党为了声援1925年5月30日在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而发动的。五卅惨案发生在上海,广州、香港并不是惨案发生地,但他们能集体举行罢工声援,这体现了中国“五湖四海”的工人阶级具有共同的根本利益和工人阶级的团结。

<sup>①</sup>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知识书店1949年版,第131页。]

将反帝爱国的工人运动的主战场从上海转到省港是经过认真、全面的考虑的。5月30日英租界的巡捕枪杀示威学生和群众，使上海工人抗议的直接对象在日本资方之外又加上了英国资本势力。广州和香港是英资最集中的地方，其工人运动历史长，基础好。香港与广州的罢工斗争必会形成对英国资本主义的直接和重大打击。1925年5月31日晚，中共广东区委即召开党员、团员大会，通报五卅惨案的经过，决定先建立“临时委员会”，联络工、农、商、学和青年军人等革命团体在省港两地举行大罢工声援。6月初，中共中央广州临时委员会指派邓中夏、黄平、杨殷、杨匏安、苏兆征五人组成“党团”，前往香港组织罢工。中共广东区委指派冯菊坡、刘尔崧、施卜、李森、林伟民、陈延年组成“党团”，到广州沙面英法租界发动罢工。6月13日，中共广东区委发表时局宣言，6月15日发表《告广东人民书》；中华全国总工会致函香港各工人团体，要求立即组织全体工人一致罢工。<sup>①</sup>

1925年6月19日，省港大罢工爆发。香港海员、电车、印刷等行业首先罢工，洋务、码头搬运、清洁、医务、邮务等工会随即响应<sup>②</sup>，15天内罢工人数就达25万<sup>③</sup>。罢工提出的总要求是拥护上海工商学界联合会提出的反帝17项要求，同时向香港殖民当局提出香港工人的6点具体诉求：1. 政治自由；2. 法律平等；3. 普遍选举；4. 劳动立法；5. 减少房租；6. 居住自由。<sup>④</sup>这些要求与诉求除了声援和支持上海工人的行动外，所要争取的6项权利中有4项是工人的政治权利。罢工的主要形式是：在香港，首先是香港工人集体离开香港的外资企业，直接返回内地；香港的服务性洋务工人（主要是家佣）离开雇主家庭，停止服务，封锁香港—广州的港口，禁止外资来香港进行运输和贸易；等等。在广州，主要是沙面租界外资工厂的中国工人罢工，退出租界，外国人住宅雇佣的中国洋务工人停工。罢工爆发后，香港陷入一

① 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省港大罢工大事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页。]

② 虽然在省港大罢工中工人的职业划分和政治态度的对应关系，与美国学者裴宜理分析上海工人起义的职业和态度关系呈现出一些不同的表现，但裴宜理的《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仍然是重要的参考。]

③ 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页。]

④ 《怒涛（省港大罢工回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0页。]

片混乱。机器停转,轮船停开,车辆停驶,商业停顿,加上交通断绝,整个香港垃圾堆积如山,粪便满街横流。“如果平均计算,罢工一月,香港英国政府就要损失2亿1千万元,罢工一日,就要损失700万元。”<sup>①</sup>1926年6月19日纪念罢工一周年时,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苏兆征在大会上总结说“英帝国主义者受重大之打击,现今损失已达十四万万亿元。”<sup>②</sup>虽然损失数据统计口径有出入,但可以估计持续罢工的经济损失是巨大的,<sup>③</sup>所产生的政治效应也是明显的:打击了外国资本尤其是英国在港资本,提高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检验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和组织力。

## 二、工会的角色:中国共产党实现对罢工领导的组织延伸

如前所述,1925年中共四大时,全国只有994名党员。从占人口比来说,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小党。广东是全国党员最多、最集中的省份,但也只有400多名党员。香港就更少,“香港的共产党员,此时还不满十人,而多为最下层的码头工人”<sup>④</sup>。这样的组织规模对于组织和发动一场特大规模的罢工来说,显然是太小了。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实现对省港大罢工的领导、组织和发动的呢?

广东和香港的党员虽少,但广东的工会组织却很发达。这一状况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立即把领导和发动工人运动当作首要任务,在企业中广泛地建立工会有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中国沿海一带已有类似工会的工人“组织”,国民党也曾在工人中建立工会。但中共一大提出的是党在当前的中心任

① 萧超然《省港大罢工》,工人出版社1956年版,第24页;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知识书店1949年版,第194页。]

② 中共广东省党史办、中共珠海市党史办编《苏兆征研究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7页。]

③ 关于省港大罢工给港英当局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目前没有统一的准确数字。罢工领导者的讲话和文章多基于当时的统计,不一定能对英、日、美、德等国贸易量有一个准确计算,因而与英国人Woodhead主编、专为外国人研究中国提供参考的《中华年鉴》(1925年卷及1926—1927年卷)的数据有出入。但无论何种材料,都显示出经济损失的重大,英国方面一直希望尽快谈判以结束罢工。但是也不能太高估经济损失的程度,因为在港英当局向英国政府提出派兵武力解决时,英国政府是一口拒绝的。]

④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知识书店1949年版,第186页。]

务是组织工人阶级，按照马克思主义工人理论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作为全国工人组织的联络机关，由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张国焘、邓中夏先后任主任。1925年5月1日，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又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取代了原来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形式上是国共合作的组织，但实际上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的组织机构与协调机构<sup>①</sup>。它的成立，不仅促成了一大批行业和基层工会组织的成立，还吸引、改变了不少原国民工会。当时许多工人可能一开始并不十分了解共产党，但他们信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组织规模还很小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建立或者影响下的工会成了中国共产党和工人之间的桥梁，成了中国共产党在工人中的组织延伸。由工会出面组织工人运动，特别容易被工人接受，具有一呼百应、事半功倍的效果。由工会直接出面动员和组织工人，实际上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省港大罢工的领导，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运动的组织能力方面的一种创新。

当时香港工会有130多个<sup>②</sup>，其中一些是黄色工会<sup>③</sup>和行业协会。罢工前，中共派了苏兆征、林伟民到香港，与全港各个工会联系，召开联席会议，商定罢工的统一要求、条件、宣言等，并成立了全港工团联合会。黄色工会的领导者开始时普遍反对罢工，但又怕背上帝国主义走狗的骂名，在工人中失去威信，加上出于虚荣和对罢工带来的可能好处的估算（如可以克扣罢工经费等）以及各方压力，最终同意了罢工。这就使得香港的工会成了罢工委员会最得力的动员组织工具。

在广州，除了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工会外，行业协会性质的工会较多。行会的特点是门派较多，行动号令不容易统一。共产党员李森、何耀全二人

① 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主要领导岗位大多为共产党员担任。苏兆征原为国民党资深党员，但此时转而参加了共产党。]

② 《怒涛(省港大罢工回忆录)》, 广东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第3页。]

③ 有资料认为黄色工会的说法起源于法国。1887年, 法国蒙索明市的一个工厂主为阻止工人罢工, 私下收买了工会。于是工人们便愤怒地砸碎了工会会所的玻璃窗, 这些工会组织就以黄色纸裱糊窗户, 从此, 工人们就称其为见不得人的“黄色工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中, 黄色工会指没有接受共产党领导和影响的或者被资本家或其政府收买的工会。]

首先打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旗帜,动员在广州沙面英美日工厂、洋行中的工人罢工,然后成立“沙面工人援助上海惨杀案罢工委员会”。虽然美国学者裴宜理在分析中国工人运动时,突出了工人内部的利益差异和分裂以及与帮会的关系,<sup>①</sup>但是,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会显然有能力、有办法使工人克服和改变不同地域与不同职业背景造就的不同态度,利用、改造或者摆脱帮会的控制,最大限度地保证用罢工的反帝政治目标团结、整合省港的各种工会<sup>②</sup>。

举行大罢工最关键的两次全港工团代表会议都是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出面,由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共产党员邓中夏主持的。这两次会议通过了《罢工宣言》、罢工诉求以及罢工指挥中心机构的组成。在组织安排上,工人听从各个工会的指令,各个工会听从总工会的号召;在罢工的行动和步骤上,工人服从罢工委员会的具体安排。由此,罢工的领导组织结构就非常清楚了(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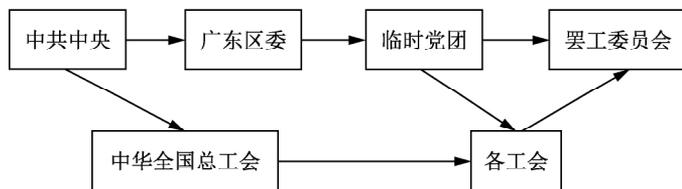


图1 罢工的领导组织结构

在这样一个双重结构中,党的中央和地方组织都通过各级各类工会组织,联系发动广大工人,在罢工委员会统一调度下行动,从而弥补了党员人数少的不足,使得进行一场规模巨大的罢工成为可能。

### 三、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和罢工委员会: 工人运动中的民主与权力

在省港大罢工中,有一个处理各项事宜、“无所不能”的罢工最高“权力机关”和执行机关——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和罢工委员会。邓中夏说“代

① 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② 是建立赤色工会以直接组织工人,还是打入黄色工会中去争取工人,当时在中共内部有过讨论。]

表大会奠定了此次罢工。这个经验我们是在这次罢工中第一次取得的。”<sup>①</sup>

罢工委员会是由罢工工人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而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则是按照每 50 个罢工工人选出 1 名代表的比例产生的。工人的意见“经过代表带到代表大会，罢工消息又经过代表带入工人群众。罢工委员会的会务及财政，皆经常在代表大会报告，以至外面一切谣言都失其效用。罢工各个机关重要职员，都经过代表大会选举，不称职时又经过代表大会随时撤职，因此罢工各机关不致腐化”<sup>②</sup>。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从 1925 年 6 月 25 日召开第一次大会至 1926 年 9 月 30 日，竟开过 166 次之多<sup>③</sup>，有关罢工的所有事项几乎都是通过代表大会讨论决定的。在中国工人运动早期，能够按照民主的原则，如此有序地成立罢工的“权力机关”并严格运行，是令人惊叹的。1925 年 6 月 26 日召开的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不仅选举产生了苏兆征、邓中夏、陈延年、罗登贤等共产党人组成的罢工委员会（7 月 3 日正式公布，共 13 人，其中香港方面 9 人，广州方面 4 人），还表决通过了罢工委员会的章程，选举产生了下属的各个机构，使罢工有了一个分工细致、职责分明、职能全面的体系。<sup>④</sup>

罢工委员会具有的职能和“权力”是非常大的，“罢工委员会简直像一个政府似的……具有一个政府的权力，可以说它是中国第一个工人政权的萌芽，是在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尝试着自己管理政治的组织”<sup>⑤</sup>。如果说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那么罢工委员会就是最高的“行政”和执行机关。

罢工委员会需要下设财政委员会及审计局，可见罢工所需和募捐所得的款项数额之巨大，以至于必须单设机构处理；也说明罢工组织者一开始就努力采取民主、公开、透明的方式处理捐款，保证罢工不在财务上被攻击和质疑，以获得最大的信任。

①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知识书店 1949 年版，第 192 页。]

②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知识书店 1949 年版，第 192 页。]

③ “9 月 30 日省港罢工工人召开第 166 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变更罢工政策、结束封锁的决议”《省港大罢工大事记》，见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省港大罢工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9 页。]

④ 见图 2。萧超然《省港大罢工》，工人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7 页。]

⑤ 萧超然《省港大罢工》，工人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20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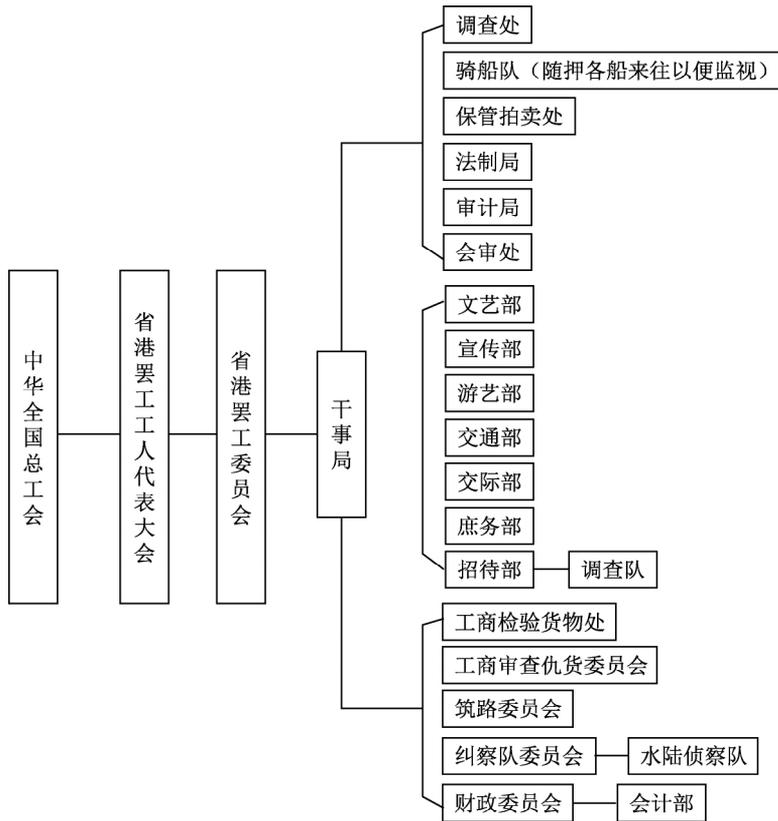


图 2 罢工的具体运行体系

纠察队委员会的设置是出于建立新秩序之需要。罢工委员会几乎接管了罢工城市的主要职能，由 2 000 多名工人组成的工人纠察队代行保护新秩序的职责，主要负责维持社会秩序和罢工秩序、严密封锁香港、保证粮食供应、扣押不合规定的物资等等。罢工委员会所设的工商审查仇货<sup>①</sup>委员会在封锁香港期间，专门审查来往商船货物，对偷运的英国货物，一律予以没收。没收的货物则交给保管拍卖处拍卖，偷运的人交给会审处审讯。法制局为起草各种规则 and 政策的机关，罢工的很多政策、规则、办法都是由法制局起草的。筑路委员会负责管理、修筑罢工城市的公路，保障交通。招待部、交际部、庶务部、宣传部、游艺部等机构是专门负责照顾罢工工人生活的。罢工委员会可以处置一切与罢工相关之事，连广东政府都不过问，因此也被港英当局

① “仇货”指敌对国家的商品和货物。]

称为“第二政府”。所以邓中夏总结说“省港罢工是工人阶级的一首功课，一首什么功课呢？叫做‘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学习’。”<sup>①</sup>“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的组织与俄国工人苏维埃是相仿佛的，省港罢工委员会俨然有一个小小政府的规模，是将来中国政府的先声。”<sup>②</sup>

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与罢工委员会所获得的“权力”和所具有的执行权，是这次大罢工能够以如此大的规模坚持如此久的时间的重要保证。

但工人运动产生的“权力”如何使用、如何制约、如何发展？这在1871年巴黎公社时就有过经验教训，后来也有持续的讨论。省港大罢工中出现的罢工委员会，满足了完成大规模罢工所需要的极大的“权力”。但怎么对工人运动中产生的“权力”进行监督制约，限制权力滥用？怎么处理与广东实际存在着的国民政府的关系，维护国共合作的局面？罢工委员会既是工人建立“政权”的尝试，也是工人运动中民主的尝试。有节制地使用权力，是一个成熟政党必须具备的能力。所以，当罢工委员会的权力似乎无所不能时，邓中夏等中共领导一直提醒不能滥用权力，避免过火过激<sup>③</sup>：“再须附带提及的，是罢工委员会一切权力都有，只没有杀人权。”<sup>④</sup>在国民政府开始北伐并占领武昌后，中共和罢工委员会便决定停止对香港的封锁，适时结束大罢工。<sup>⑤</sup>

#### 四、罢工经费筹措和使用中的政党能力

经费本来属于政党组织的外在因素，但由于它具有给政党提供活动能量的作用，因此它由外在条件转变为内在条件，并成为政党构成和生存发展不可或缺的要害之一。在政党为完成目标而开展的活动中，除了思想资源、人

① 邓中夏《工人阶级的一首功课》，见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省港大罢工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7页。]

② 转引自萧超然《省港大罢工》，工人出版社1956年版，第20页。]

③ 因为有过火的事件发生。]

④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知识书店1949年版，第192页。]

⑤ 1926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发表《为省港罢工自动的停止封锁宣言》，罢工工人第166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变更罢工政策、结束封锁的决议。参见《省港大罢工大事记》，见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省港大罢工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页。]

力资源等外,经费资源也是一项重要的资源。这对于执政党、在野党、革命党来说无一例外。因此活动经费的筹措能力是一个政党组织、动员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在早期领导工人运动时,与世界工人运动一样,也是选择了罢工这个常见的启发动员工人觉悟、表达和实现工人要求、打击资本家的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但组织罢工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即要解决罢工期间工人的生活问题。旧中国的工人工资水平极其低下,一般都是日工资制,工人家庭普遍没有积蓄。罢工的组织者必须安排好工人的生活,才能让罢工坚持下去,因为在日工资制下,别说工人十几个月不上班,即使十几天不上班,也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一般而言,罢工的时间越长,对资本的打击就越大,但罢工成本也就越高。192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省港大罢工,曾创造了世界工人运动史上的奇迹——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16个月),对帝国主义打击很大。但是,组织这样一场大规模、长时间的工人罢工运动,需要的经费也是非常多的。罢工16个月,意味着参加罢工的约25万名工人(在16个月中罢工人数是有变化的)长期不上工,那么工人及其家属的生活安置就是一个极大的问题,特别是从香港回到广东的十几万工人的住房、吃饭、看病等都成了问题。还有维持社会秩序、组织工人学习活动等也都需要经费。虽然罢工的发动者对工人做了很好的动员和宣传工作,但不能要求工人同政治家一样有远大的政治目标和持久的信念、动力。安置不好,复工就随时有可能发生。

所以,在这场大罢工中,罢工工人的生活是否能够得到妥善安置是罢工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对罢工所需经费的筹措和监督使用,检验着政党的动员力、组织力和协调力。

### (一) 筹款体现出的组织力和协调力]

有人将二十几万罢工工人每天需要的最低生活费<sup>①</sup>以及维持3000名罢工

<sup>①</sup> 广东省档案馆收藏的广州报刊等信息汇集材料中记载有“罢工委员会自本月10日(1926年)起,已经开始照政府之安排,对罢工工人每人先发放十元之补助”这是一个比较具体明确的数字。但对于前期罢工工人的具体补助或者最低生活费,至今都还没有看到准确的数字记载。转引自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省港大罢工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75页。]

工人武装纠察队、租用房屋、学习宣传、封锁港口码头、审查货物等活动所需费用加在一起，估算得出罢工委员会每天的支出是 7 000—9 000 元。<sup>①</sup> 港英等外国资方则估计，25 万工人大规模的罢工每月平均开支至少 30 万元。按照这个标准计算，16 个月的罢工至少需要 480 万元。<sup>②</sup> 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史》中谈到光收到的捐款一项大概就有 490 万元。这一巨额的罢工经费的构成主要是：

1. 呼吁全国人民捐款支援。从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呼吁全国人民给予支持。省港大罢工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加大争取人民支持的宣传。按邓中夏计算，省港大罢工第一年，来自全国各地的捐款至少有 25 万元。<sup>③</sup>

2. 接受海外华人华侨的捐款。海外华人华侨的捐款占罢工所得捐款的一半以上。首先，这个群体爱国并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欺压和暴行；其次，这个群体在海外生活工作的状况普遍比国内普通民众好，有经济实力。因此，共产党人苏兆征等通过各种关系、各种渠道向华侨进行宣传，发表《致海外华侨书》。有海外关系的工人也积极与国外亲朋好友联系。包括新加坡、马来亚、暹罗、高棉、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缅甸、日本、美国、加拿大、巴拿马、古巴、秘鲁、墨西哥、法国、英国、丹麦、澳大利亚在内的几十个国家的华侨，为声援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捐款超过 300 万元。此外，他们还捐赠了不计其数的大米、面粉等物资。

3. 争取苏联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捐助。由于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和国际无产阶级联系密切，因此得到了来自苏联和国外无产阶级组织的援助<sup>④</sup>。1925 年 6 月 25 日，联共（布）派维经斯基赴上海指导，派鲍罗廷赴广州指导<sup>⑤</sup>。苏联

① 参见 T. H. 阿卡托娃《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的省港大罢工》，《历史教学》1956 年 8 月号。]

② 邓中夏《一年来省港罢工的经过》，见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省港大罢工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84 页。（此文原载于 1926 年 8 月 31 日出版的《省港罢工概观》。）]

③ 邓中夏《一年来省港罢工的经过》，见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省港大罢工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84 页。]

④ 欧洲无产阶级组织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捐款数字暂时没有准确记载，苏联学者 T. H. 阿卡托娃在《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的省港大罢工》中所说的 500 万美元的数字应该有误。]

⑤ 苏联对罢工的指导和介入，更多表现在他们提出罢工适时结束的方案并促成此事。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卷，中共中央党史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643 页。]

工会派代表到广州送去捐款5万美元。1925年12月初,苏联“列宁”号远洋轮船运送一船物资到广州支援罢工。<sup>①</sup>

4. 充分利用国共合作的条件,争得广东国民政府的支持。罢工工人对于广东军阀势力的威慑和打击,帮助了国民党在广东境内扫清军阀势力,建立政府。广东国民政府也需要得到罢工工人的持续支持。共产党充分利用国共合作的局面,争取到了广东国民政府每月支付罢工委员会1万—3万元的资金支持。同时,广东国民政府还把政府的部分捐税以及粮食等物资拨给罢工委员会使用。按邓中夏的计算,这部分款项在罢工第一年就达280万元。<sup>②</sup>

5. 行使罢工委员会收缴罚没款的权力,对破坏罢工的资本家和企业进行罚款,没收外国商船和不法商人的走私物品并拍卖。按邓中夏的统计,这两部分所得款项有60万元之多,都用作了罢工经费。<sup>③</sup>

6. 组织工人自助。工会组织的党员骨干通过打工、出苦力、做临时工来挣钱贴补罢工工人生活,广州没有罢工的工人每月拿出5%的工资捐给罢工委员会。

罢工委员会下设财政委员会和审计局。苏兆征为财政委员会的委员长,他会定期在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上报告财政收支情况,接受罢工工人代表的监督。罢工委员会1926年3月29日公布的《审计局组织法》明确规定,审计局在组织上“直隶于省港罢工委员会”,“审计局须每日一次将已审计之数目、单据、汇表呈报省港罢工委员会”。从为罢工款项的收支专门设置两个机构,即可想见罢工涉及的款项之巨。

罢工得到的捐款,首先和主要用于安置罢工工人及其家属的生活,这是让罢工维持下去最重要的保障。从香港撤回的罢工工人到达深圳、广州后,愿意回老家的安排回老家<sup>④</sup>,不愿回老家的被罢工委员会分别安排在被广州工人组

① 《怒涛(省港大罢工回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8页。]

② 邓中夏《一年来省港罢工的经过》,见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省港大罢工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4页。]

③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知识书店1949年版,第201页。]

④ 根据裴宜理的研究,中国工人的籍贯和家乡地域对于工人的政治态度与行为是有影响的。本文没有收集罢工工人的籍贯分布情况,但从安排罢工工人回老家一事看,除了广东籍的工人外,应该还有其他省份的工人。]

织查封了的赌馆和烟馆<sup>①</sup>、已经实现了罢工的广州外资企业的职工宿舍<sup>②</sup>、租借的祠堂校舍和爱国华侨建造的酒店中住宿<sup>③</sup>。工人们凭罢工委员会发的饭券到罢工委员会指定的食堂吃饭，若生病则由临时开设的工人医院免费治疗，此外还发放过微薄的工资补贴。<sup>④</sup> 宣传部、游艺部还经常组织工人开展看电影等业余娱乐活动。

## （二）罢工经费使用中体现的政治社会化意图]

罢工工人在罢工期间除了参加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封锁港口，监视资方活动，筹集运输粮食，在市民中进行宣传等等外，还参加由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的学习和训练。罢工所得捐款的一部分用来建立劳动学院、宣传养成所、劳动补习学校、子弟学校等等，这些都成了工人学习革命理论和文化的场所。学习经费的支出在一般罢工运动中是很少出现的。虽然这次罢工持续时间长，为学习提供了时间条件，但在罢工中让工人学习革命理论、文化、军事，提高政治觉悟，了解共产党，培养出了一批工人运动骨干，仍是十分难得的。如此，罢工的意义就不仅仅在于它是一场共产党领导的抗议活动和反帝政治斗争，而且在于它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途径。政治社会化是社会成员在社会政治活动中逐步获取政治知识和能力，形成政治意识、政治立场、政治认同的过程。家庭、社区、学校、社会阶层、媒体、单位、组织都可以是社会政治化的媒介。政党通过政党活动影响和动员社会成员，使其对政党产生认同的过程，也可以称为政党社会化。

15岁就参加了省港大罢工的海员工人子弟黄宝南回忆，他和家人一起从香港返回广州后认识了海员工会工人办事处党支部的负责人陈春霖、陈日昌、梁祖怡，他们经常和他谈话，帮助他进步。

① 《怒涛(省港大罢工回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页。]

② 参加过罢工的黄宝南回忆说,他与母亲从香港撤回广州,住在沙基“浩生轮船工人宿舍”。参见《怒涛(省港大罢工回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5页。]

③ 比如华侨集资兴建的由三栋大楼组成的嘉南堂,不仅被安排给从香港撤回的罢工工人暂住,还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创办的劳动学院的校址。]

④ 《怒涛(省港大罢工回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2页。]

有一次,他们把我叫到房间去谈话,陈春霖首先问我“你看现在工人的生活痛苦吗?”

“非常痛苦!”我毫不踌躇地回答。

“怎么办?”陈日昌问。

“要革命。”我激动地答道。

“要革命是不是就这样各干各的?”梁祖怡向我问道。

“不成,要有个头。”我经过考虑才回答。

“对呀,革命要有共产党的领导!你想不想做一个共产党员呢?”<sup>①</sup>

这是在罢工中进行政党教育和培育政党认同的一个典型案例。不过,黄宝南因为年龄太小,就先加入青年团,然后被送到中华全国海员总工会宣传养成所学习了50天。一个年轻的工人革命者就这样在罢工中成长了!“罢工”也成了一所“学校”,成为政治社会化的途径之一。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占领武汉。中共广东区委、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商量研究,认为在维持罢工工人利益的原则下,考虑到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要采取主动步骤停止经济封锁,结束罢工。中共广东区委发表《为省港罢工自动的停止封锁宣言》,省港罢工委员会也发表《停止封锁宣言》。这一天,广州市30万民众举行盛大集会,拥护停止封锁、结束罢工的决定。至此,1925年6月19日开始的省港大罢工到1926年10月10日宣告结束。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发动的这场长达16个月的罢工,起到了声援上海工人斗争、宣传反帝和革命、动员工农、扩大共产党的影响等作用,达到了中共的政治目标,检验了中共的动员力、组织力、领导力以及与国民党合作的能力。到1927年中共五大召开时,党员人数从四大召开时的994人增加到57967人。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不足千人的政党领导的这场世界上少有的大罢工,堪称大手笔。这个大手笔之所以能够写就,原因首先在于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工人阶级政党、革命党的性质;其

<sup>①</sup> 黄宝南口述《回忆省港大罢工的日子》,见《怒涛(省港大罢工回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6页。]

次在于中国共产党巧妙地通过工会作为阶级组织的延伸和支撑，将罢工代表大会和罢工委员会作为“权力”机构和执行机构，将工人纠察队作为准武装力量，利用国共合作的政治时机和人民的广泛同情完成数额巨大的经费筹集，以及通过举办学校和学习培训扩大工人的政党认同，从而将一个革命政党的动员力、组织力、领导力发挥到了极致。省港大罢工这个案例丰富深化了人们对于政党能力的认识。